

中国

钱文荣 马继国 著

城市化
道路探索

——以海宁市为例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城市化道路探索：以海宁市为例/钱文荣，马继国著.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9

ISBN 7-109-08487-6

I. 中... II. ①钱...②马... III. 农村-城市化-研究-海宁市 IV. F299.27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6991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26)

出版人：傅玉祥

责任编辑 白洪信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2.75

字数：225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30.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课题组成员名单：

项目主持人：钱文荣（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马继国（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项目组成员：毛迎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讲师）

黄天云（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

潘伟光（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副教授 博士）

王文军（浙江省海宁市建设局 副局长）

曹建飞（浙江省海宁市计经委 副主任）

执 笔：钱文荣 马继国

主 持 单 位：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

前 言

21 世纪，是世界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世纪。有关研究认为，到 2025 年全球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65%，发展中国家为 61%，发达国家为 83%（赵树枫等，1998）。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城市化进程中造成农村破产，农民贫困，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而若干城市出现恶性膨胀、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就业困难、住房拥挤等尖锐矛盾，提出了发展农村城市化的战略。法国在 1965 年制定了官方新城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有助于吸引和安置增长的人口。前联邦德国通过区域规划来调整城市生产力布局，对欠发达地区编制四年一期的“完善发展计划”，有重点地采取两项经济刺激政策：一是优先资助欠发达地区进行公路、水路和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二是对在欠发达地区建厂的单位减税 10%。荷兰政府为了协调大、中、小城市生产力布局和人口比例，通过行政手段和投资补贴以及低息贷款等经济措施，引导城市圈工业和人口向中、小城市转移。从以上几个发达国家城镇建设战略看来，如何通过区域规划使工业布局、人口分布、基础设施趋向合理，使城乡同步发展，使小城镇现代化，使小城镇物质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成为人们乐于居住、工作、学习的地方，以防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大城市，从而实现国家的战略目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有不少有益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目前，城市化也已成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中长期和短期问题的关键之一。首先，农村城市化是扩大内需，从而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必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现象，尤其是近几年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导致了少数较富裕的人购买力强而购买欲望弱，多数人尤其是大量农村居民虽有较强购买欲望但购买力低的现象，难于进一步扩大现实需求。这正是 1995 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一直受到有效需求不足困扰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提高占总人口 70% 左右的现有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在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决定了农业产值和农民收

入的增长不可能很快；而农产品需求弹性小的特点，往往造成农业即使增产了也会因价格的大幅下降而不能增收的现象。因此，只有让大量的农村人口真正转移到城镇，实现农民身份的根本改变，既使进城的居民从农外取得较高收入，又使留在农村的居民可通过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从根本上缩小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从而有效地扩大内需，保障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其次，城市化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从1978—2001年这23年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增长了4.6倍，同期农村非农劳动力比例也相应地从7.12%增加到30.62%。但是随着近年来乡镇企业的转制和结构性调整，其对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吸纳能力明显减弱，每万元投资吸纳的劳动力人数由1984年的9.1人，已下降到2001年的0.51人。与此同时，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农业的全球化，农业本身为农民提供的就业机会将日趋减少，我国农民就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以城市为载体发展二、三产业是解决我国农民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再次，城市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政府正在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但是仅靠生态区建设，养活不了现有的那么多人口，如果不从数量上减少农民，“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就难于真正实施。

浙江省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以乡镇企业为主力军的农村工业化和以小城镇为主角的农村城市化已成为其率先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迅速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2001年，全省非农乡镇企业数达108万个，总产值15 464.52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成为浙江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与此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到2001年，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1 781.2万人，占总劳动力的64.2%，其中仅农村工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就达929万人，比1985年增加了1.68倍。在农村工业化的推动下，城镇人口逐步上升，城镇数量大量增加，小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初步形成了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的城镇规模结构体系，形成了由沿海平原向内陆山区推进的城镇布局态势。

但是农民转移中的“离土不离乡”，导致了浙江产业的非农化程度高，而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局面。2001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6 748亿元，非农产业国内生产总值6 053亿元，非农化程度达89.7%。但由于浙江农村人口就业结构和农村人口的空间转移错位，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聚程度低，集聚规模小，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农村非农化程度高而城市化低，城市化大大滞后于

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水平只有 40% 左右。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产业的上规模上水平，阻碍了浙江经济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却普遍出现了农民不愿进城的现象，我们在调查中，甚至发现了不少前几年已经把户口迁入城镇的农民，要求重新迁回农村的现象。

海宁市作为我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市（县）之一，经济发达，连续四届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行列，1995 年被列为浙江省首批“小康县（市）”之一。2001 年国内生产总值 135.34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1 134 元，在浙江省各县市中名列第 4 位。近年来，该市的城市化也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据初步调查研究，2001 年城市化率已达到 45% 以上，走在浙江省前列。因此，以海宁市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和对策，将不仅对于海宁市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对于整个浙江省乃至东南沿海地区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而且也将为国内其他地区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政策思路。

本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项目“海宁市农村城市化发展的趋势、道路和对策研究”（Z01YJ1）的总报告。该项目由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钱文荣博士，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继国先生共同主持，课题组主要成员有：毛迎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讲师）、黄天云（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潘伟光（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王文军（浙江省海宁市建设局副局长）、曹建飞（浙江省海宁市计经委副主任）。项目研究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立足点，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经济主体行为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相互协调为主线，在分别对海宁市还未转移、已经转移的农民以及农村企业家的迁移行为、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和计量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民（包括农民企业家）的选择与以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的社会选择之间的比较研究，揭示农村非农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转移的一般规律及其对城市化道路的影响；探讨使农民行为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互协调的城市化道路和相关制度、政策框架。本书的写作由两位主持人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第八章由钱文荣撰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由马继国撰写。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曾骅主任，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祖辉教授、副主任林坚教授等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项目调查过程中，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朱雪明先生，海宁市国土资源局沈炜副局长、孙国新先生，海宁市计经委陈明先生，海宁市体改委陈

端良先生，海宁市建设局朱诉沂先生，海宁市公安局王政女士、海宁市农经委钱志达先生，海宁市统计局朱明波先生等给予了大量的帮助，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田万获、金晶瑜、胡慧洪、邬静琼，海宁市硖石镇、周王庙镇、许村镇、黄湾乡、马桥镇、斜桥镇、袁花镇等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相关成员参与了项目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在此深表谢意。

在本书的调研和写作过程中，引用和参考了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本项目的调研和出版得到了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大卡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经费和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的资助。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理论综述与概念界定	1
第二节 研究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10
第二章 世界城市化历程与发展模式	14
第一节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程	14
第二节 农村城市化的基本模式	19
第三节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21
第三章 海宁市城市化发展的宏观背景	27
第一节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道路	27
第二节 浙江省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问题	36
第四章 海宁市城市化现状与发展思路	57
第一节 海宁市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状况	57
第二节 海宁市城市化发展的措施、成效与问题	60
第三节 海宁市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若干思路和对策	80
第五章 海宁市的资源配置效率与城市化道路选择	86
第一节 海宁市城市化资源配置效率基本情况	86
第二节 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的城市化道路选择	90
第六章 海宁市城市化过程中各类主体的经济行为分析	99
第一节 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行为分析	99
第二节 中小个私企业家迁移决策行为分析	108

第三节	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决策行为分析	111
第四节	引导经济主体迁移行为, 促进城市化发展的若干建议	112
第七章	海宁市城市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与布局	115
第一节	非农产业的崛起与农村城市化	115
第二节	现代高效农业与城镇发展	129
第三节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合理布局, 促进城市化合理发展	136
第八章	海宁市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	144
第一节	缓解城市化过程中人增地减矛盾的若干措施	144
第二节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制度改革	148
第三节	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	162
第九章	海宁市城市建设中的资金问题	176
第一节	海宁市城市建设投资基本情况	176
第二节	城市建设资金运作模式创新探索	179
参考文献		195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理论综述与概念界定

一、城市化及其相关概念

(一) “城市化”术语溯源

据有关资料,“城市化”一词可能来自于拉丁语 *urbs* (城市) 一词,由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依勒德丰索·塞尔达 (Ildefonso Cerdà, 1816~1876) 在《城市化概论》一书中首次提出 (陈光庭, 1998)。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在我国研究城市与乡村的有关学术文献中开始出现“城市化”一词。但是,直到今天,关于城市化一词的内涵、外延及汉语表达形式,在学术界依然众说纷纭。

(二) “城市化”定义

关于城市化概念的定义,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和表示。根据对“城市化”内涵和外延理解的不同,中国学术界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表述。

第一,城市化就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城镇化指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镇地区集中的过程” (辜胜阻, 1991)。

第二,城市化既包含人口和经济从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也包括了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整体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农村地域的扩散。有的学者指出,“人口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在地域空间单纯的移动问题,也不仅仅是居住区向城市汇集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乡村传统封闭的文化向城市现代、开放文化的转变和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趋向于按照城市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方式发展的过程” (刘加强, 1997)。“城市化……的一种情况是大量不再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涌向既有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经济和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但由于过度聚集而引起的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负效应,则将导致经济和人口由密集的市区向郊区和周围地区扩散,从而推动周围地区的乡村城市化” (胡序威, 1997)。

第三,除了包含上述的含义外,城市化还包括城市数目逐步增加,城市用

地规模不断扩大,城市设施密度和质量不断提高。对于这样的界定,有的学者把它归纳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的含义……第一个层次是乡镇不断地转化为城市并最终为城市所完全同化;第二个层次为乡镇本身内部的城市化;第三个层次是城市自身的发展,即所谓‘城市的城市化’……”(高佩义,1991)。《辞海》中对“城市化”的定义则为“……①城市数量增加或城市规模扩大。这一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现代大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其结果表现为城市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上升。……②将城市的某些特征向周围的郊区传播扩展,使当地原有的文化模式逐步改变的过程”。

本文采用具有最广泛含义的第三种表述,同时,由于这样的“城市化”概念难于用一个简单明了的指标来衡量,所以我们将在不致引起误解的前提下,在文中某些地方采用“人口城市化率”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三)“城市化”与“城镇化”

中国的城市化理论研究对于“城市化”与“城镇化”两个概念的外延存在着如下三种界定。

1. 城市化的外延大于城镇化 这里的“城市化”包括了“市”和“镇”,而城镇(建制镇)属于“城市”的组成部分,从而把“城镇化作为城市化的一部分,主要指农村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楚国良等,1998)。

2. 城市化外延小于城镇化 这里的城镇包括了“城(市)”和“镇”,而设市城市则为城镇体系的组成部分,并把“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作为平等范畴并列于城镇化的概念之下。典型表述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非农化并举。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过程,农村城镇化、非农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县域范围内的城镇集中和农业人口就地转移为非农人口的过程”(辜胜阻等,1993)。

3. 城市化等同于城镇化 依据是我国的城市和城镇概念的一致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规定:本法所属的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市和镇构成了我国完整的城镇体系。因此,城市化和城镇化只是称呼不同,而没有实质差异。

从当前的学术文献资料看,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有的学者指出,“在广义上,我国的‘城市(包括市和建制镇)’与‘城镇体系(包括城市和镇)’概念一致,同时也与英文‘urban(市和镇)’一词语义相符,为了完整理解和表达 urbanization 这一术语和内涵,作者主张把‘城市化’和‘城镇化’作为同义语对待”(陈平,1998)。“城市一词来自拉丁语 urbs,它本身包括城市(city)和城镇(town)……为了统一术语,便于学术交流,还是使用

‘城市化’一词为好”（陈光庭，1998）。笔者也同意这种观点，因此文中将不再出现“城镇化”一词。

（四）“城市化”与“农村城市化”及“乡村城市化”

农村（campagne）一词，法国的一些地理学家已经把它看成“过时的词汇”，给它的定义是“一个封闭的、有限的和象征性的世界。人们在里面生活是以生物节奏和四季节奏测定时间。人们成群居住在一个功能单一的农业社团中，以便满足大家的基本需求”（R.Groussard, 1996）。今天人们不再经常使用这个词汇而常用“乡村”（rural）来取代，其目的不仅是因为农村的居民起了变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其中居住的空间和社会环境起了变化。“在过去称之为‘农村’的城市以外的这类空间的功能中，农业的优势地位已经结束”（P. Horee, 1996），“乡村空间”的概念具有人类学的内涵，排除了没有人烟的未开发地区，相当于地球上可居住部分的非城市化空间。而且并不排除那些各种形式的聚焦点、活动中心和一些中小企业附近形成的小镇”（陈光庭，1998）。

乡村空间这个专业术语，今天已广泛地在世界各大洲使用，但在我国，“农村”与“乡村”混用的情况仍较为普遍，从而“农村城市化”与“乡村城市化”也经常混用，而且以用“农村城市化”一词的居多。为了与我国习惯的表达方法相一致，本文中除了在引用其他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的观点时采用“乡村”一词外，一般还是采用“农村”一词。

关于“农村城市化”的内涵，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敏锐地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① 恩格斯则对这种乡村城市化作了更详细的描述：“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居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需要有其他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在农村中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会有工厂城市的萌芽。”^②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城市和农村的相互关系，从而建立了在20世纪后被命名为“乡村（或农村）城市化”的科学理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外国学者对“乡村城市化”内涵的理解，是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不同的，他们多数认为，乡村城市化是人口从城市向乡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4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0～301页。

的流动。例如，法国学者皮尔·麦尔兰认为“乡村城市化是指乡村空间的缓慢的城市化过程，……乡村城市化区的人口由城市内迁移而来。”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农村城市化是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农村小城镇化。即加强农村建制镇、村镇建设，使农村居住方式适当聚集，实现村镇布局的规范化、合理化。有的学者提出，乡村城市化“主要指乡村地域的城市化，侧重于以发展小城镇为主”（胡序威，1997）。“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居民的居住方式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那就是因地制宜，适当聚集。例如围绕城镇，组团式布局，或者采取‘撤村并点’等措施……”（郑弘毅等，1998）。第二，农民生活城市化，即农村地区分享到城市性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农村城市化最本质之处，通俗地讲，就是使农民过上与城市居民无多大差别的生活。只要城乡生活水平提高了，城乡之间的差别缩小了，无论人口归属于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居住地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可称为农村城市化了”（郑弘毅等，1998）。第三，农村经济现代化。包括经济结构综合化、生产手段现代化等。我们认为，只要发生了上述三个方面中的某一现象，便可认为是出现了“农村城市化”过程。

二、理论综述

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历史上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口流动的原因、规律，借此探讨城市的成长机制。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的原因。在其著作《政治算术》中，比较利益差异被看成是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列宁还指出，城乡差别是造成城乡人口流动的经济动因。

以杜能（J.H.von.Thünen）（1826）、韦伯（A.Weber）（1909），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1933）和廖什（A.Losch）（1939）为代表的区位理论确定了城市的分布状态和分布形式。

德国经济学家屠能在他 1926 年发表的《孤立国》中提出了工业区位论的基本思想。其主要论点有：（1）手工业工场在布局上主要指向交通方便，技术劳动集中，拥有相当消费能力的城市。但那些在加工过程中原料使用过多的工场则应布局在原料产地，以节约运费。（2）占用大量投资的工厂设在资金较充裕的富国较为有利。（3）工厂的规模受到市场及其销售量的限制，而规模的大小又限制着分工的水平与可能应用机械替代劳动的程度。分工与机械化水平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制成品的成本。这里，屠能提出了工业布局的指向问题，即交通指向，市场指向和原料、资金指向，而且初步意识到了规模与经济效益

的联系。

韦伯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区位因素理论系统化。区位因素，指的是在特定地点或在某几个同类地点进行一种经济活动比在其他地区进行同种经济活动可能获得更大利益的因素。这种利益也就是生产成本的节约。韦伯对区位因素进行了三种不同的分类：一般区位因素（运费、劳动费、地租等）和特殊区位因素（特殊生产技术要求）；地方区位因素与聚集、分散因素；自然技术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

韦伯比屠能的进步之处在于：（1）韦伯看到自然技术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对工业区位的影响；（2）韦伯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并借此为不同的工业找到最优区位；（3）韦伯奠定了工业向城镇聚集的理论基础。

韦伯对聚集因素和分散因素下了明确定义：聚集因素是由于把生产按某种规模集中到同一地点进行，因而给生产或销售方便带来利益或造成的节约。分散因素则是因为把生产分散（分布到多个点上）进行而带来的利益或产生的节约。工业的聚集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低级阶段主要表现为工厂规模的扩大，高级阶段则表现为许多在生产上、销售上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工厂向一个地点集中。聚集使企业便于采用新技术，使生产进一步专业化；可以更好地开展厂际分工协作，更合理地组织劳动力，更廉价地购入原材料，大量运销产品；更易于取得银行贷款，并且还可以共同使用许多辅助设施与基础设施，减少间接开支，从而可以按不同比例降低每个参加聚集的工厂的生产成本。聚集经济并不是无条件的，那种无任何联系的、过渡的偶然性聚集，只会给地区经济造成恶果。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城镇之所以迅速发展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生产规模的扩大。二是生产的集中或聚集。前者涉及工业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涉及工业聚集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指的是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它的长期平均成本降低，从而生产节约。英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化学品、基本金属、资本设备和像汽车、电气用品之类的耐用消费品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聚集经济效益的对象是宏观单位，如城市和区域。城市聚集经济效益是指城镇规模扩大后引起企业某些外部经济效益增加。如果把规模经济效益称作内部效益（指企业），聚集经济效益则是指外部效益（指整个城镇）。

在韦伯以后有许多经济学家都阐述了聚集经济。

刘易斯（W.A.Lewis）的两部门人口模型（1954）以及后来的费景汉（John C.H.Fei）、拉尼斯（G.Ranis）和乔根森（D.W.Jorgenson）、托达罗（M.P.Todaro）等人分析了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一般规律。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作了研究之后指出：“一个城市在其规模达到 30 万人以后，就会失去其规模效益。相当经济的办法是应该发展大批的农村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都拥有一些工厂、电站、中等学校、医院以及其他一些能够吸引居民的设施。”刘易斯在这里提出了城市的适度规模问题。

佩鲁 (F.Perroux)、缪尔达尔 (G.Myrdal)、赫希曼 (A.D.Hirsthman) 等人指出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E. 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 的“田园城市”则提出了使各区域相对均衡发展的基本思路。除了上述各种经典理论以外，根据 20 世纪 70 年代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新特点，国外学者也进行了大量新的研究。例如，对由美国城市规划师贝利 (B.J.Berry) 首先提出的“逆城市化” (deurbanization) 现象的研究；美国学者 (Ray.M.Northem) 关于城市化阶段的研究；日本学者矶村英一关于评价城市化指标体系的研究等等，都对我们研究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相关理论又有了较大发展。美国城市地理学家 Northem (1979) 提出了城市发展的 Logistic 生长曲线，把城市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个阶段人口流动的不同特点；Vilallonga (1998) 认为人口迁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的迁移习惯、家庭经验、工作经验、成功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实现等因素都会影响其迁移行为。Stark 和 Bloom (1985) 认为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并不是仅仅由自己决定，而是与家庭共同商量的结果，而“关系网和地缘、亲缘关系”式的迁移是一种广为人知的迁移行为特征模式。Seeborg 等人 (2000) 则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后，指出政府必须努力消除一系列的制度障碍，并用经济动力来鼓励农村人口迁移。

人们常用的用于分析城乡结构变动的模式主要有三种，即：(1) 刘易斯的劳动力与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力流动模型；(2) 指出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与必要条件的乔根森模型；(3) 还有托达罗模型指出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和城镇中就业概率这两个因素是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变量。

国内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对现状的分析研究，找出影响我国人口流动、迁移的因素。总结了不同时期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特点和规律，并指出不足之处，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法。

张培刚教授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从劳动力弹性的角度探讨了产业转换的历史必然性。张教授指出在扩张的经济中，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总的来说要大于农业，这种差异使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

辜胜阻教授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一书中,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各流派的劳动力非农化、人口城市化的思想,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的城市化战略——二元城市化:一方面,利用一次城市化形成的城市基础,大力发展交通和通讯业,推行以发展城市圈带为特点的网络型城市化;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农村非农企业的作用,以县城为依托,推进农村范围内的据点发展式城市化。其后与简新华合作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更是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问题,对政府的政策做出了大量的建议。

20世纪90年代,高佩义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高氏定律”,首次提出“城市化三大规律”,即城市化进程阶段性规律、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和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规律。

1998年郑弘毅教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以农村城市化为书名的专著《农村城市化研究》。在这本书中,郑弘毅教授探索了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体系,对农村城市化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且对农村城市化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一直是城市化研究的重点。1982年在全国规划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并执行至今的中国城建方针:“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中国政府对待城市化的基本态度,但围绕这个基本方针,学术界争论异常激烈,主要意见有:

1. 应走小城镇发展的道路 多数学者认为现行的城建方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他们根据中国地域广阔、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从农村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去向,乡镇企业发展中协作和聚集的要求,大城市自身存在的矛盾,小城镇在组织和服务于农村生产、生活和协调城乡关系中的作用、国家经济的总体承受能力以及从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的长远目标出发,认为中国应当把以小城镇为主,实现乡村工业化作为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2. 走集中型城市化发展道路 一些学者,特别是地理学界的学者,根据城市发展的经济效益,大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自身改造扩展的要求和我国大城市发展现状以及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认为我国正处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城市化阶段,要重视大城市的发展,提出:“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初期必须走集中型的城市化道路,我国也不例外。”“我们应选择集中型城市化的途径。从经济效益上看,由于宏观规模经济的作用,大城市的百元资金产出最高,因此对各层次城市的发展在规模上不应限制。”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大城市要超前发展的观点。

3. 走中等城市的发展道路 部分学者从中等城市兼有大小城市优点而少有两者的不足,且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良好发展效益出发,认为大城市和小城

镇各有弊端，小城镇的弊端主要在于浪费土地、能源，经济效益不大，环境污染严重等，而大城市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惟有中等城市才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或将其作为现阶段发展的重点。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大小之争，实际上是涉及长远目标与现实要求、理论概念与客观实践以及如何辩证地、全面地认识我国国情和大小城市建设发展中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客观实际表明：一方面在控制方针下大城市的发展仍然十分迅速，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涌向大城市；另一方面农村小城市也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其发展势头更为猛烈。

关于集中型的城市化道路，世界城市化的众多经验和我国城市发展建设的现实表明，目前大城市中新的“城市病”在我国已日益明显，表现在：（1）大城市的淡水资源日益缺乏，众多大城市面临着缺水的危险；（2）大城市的经济效益差，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效益低下，生产基础薄弱，从而陷入经济恶性循环的境地；（3）大城市的贫富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形成城市人口中不同的利益阶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4）大城市流动人口多，犯罪率上升，增加了管理与服务的难度，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的压力。城市污染加剧，环境恶化，生存空间缩小，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下降。在经济转轨时期，在实施“两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大城市并非不发展，但这种发展应该是一种内涵式的发展，它要求大城市首先是要搞活自己的经济，抓住大城市科技文化集中的优势，增大工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化，从而发挥大城市经济中心的带动作用。

关于中等城市的发展道路，我们把它放在分散型城市化道路中加以研究。在城市化战略中，我们认为：我国的中等城市大多是一个地区级的经济中心，也是一个地区性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因此它是相对于大城市经济中心的次中心，也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社会和消费中心，作为地区经济中心，它在城市本身的结构体系和城市化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合理发展中等城市，也就是要逐渐把我国各地区相对落后、社会经济科技欠发达的地区级城市建设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经济起飞、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和乡镇工业发展的新型生长点和管理中心，在中等城市这一层次上，实现城乡经济的交流、融合和一体化协调发展。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城市道路就是一条分散性的城市化道路，这是我国城市化发展和社会经济所决定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是因为：（1）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表明，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是一条不符合中国实际、不利于城乡经济发展的道路。起点晚、水平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形成虽然与我国特定的地域环境、众多的人口密切相关，但更与走集